



西哈努克回忆录

——我同中央情报局的斗争

K833.357/1

西哈努克回忆录

——我同中央情报局的斗争

诺罗敦·西哈努克口授

W. G. 贝 却 敌 整理

王 俊 铭译

郑 文 华校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40304



商 务 印 书 馆

1979年·北京

740304

MY WAR AGAINST THE CIA
The Memoires of Prince Norodom Sihanouk
as related to Wilfred Burchett
The Penguin Press, 1973

内 部 发 行

西哈努克回忆录
——我同中央情报局的斗争

诺罗敦·西哈努克口授

W. G. 贝却敌整理

王 俊 铭译

郑 文 华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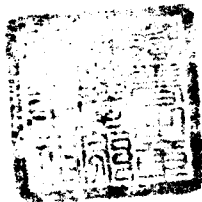
武 汉 市 江 汉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 1/32 9⁸/₁₆ 印张 203千字

1979年7月第1版 1979年7月鄂北第1次印刷

印数, 1—43,000册

统一书号, 8017·244 定价, 0.76元



译 者 的 话

本书是西哈努克在北京居住期间于 1972 年春前后向澳大利亚记者贝却敌口授，经贝却敌整理的回忆录。西哈努克为此亲自作序。现在译出，作为一段历史资料，供读者参考。

1979 年 2 月

目 录

前言——W. G. 贝却敌	1
序——诺罗敦·西哈努克	5
第一章 莫斯科——北京	7
第二章 策划背叛	24
第三章 通往3月18日的道路	39
第四章 抵抗的开始	53
第五章 马尼拉插曲	71
第六章 美元援助要付什么代价？	89
第七章 “达琼阴谋”	102
第八章 幸存的奇迹	113
第九章 极其痛苦的决定	125
第十章 彻底决裂	138
第十一章 独立乃是最重要的问题	151
第十二章 从放弃王位到被废黜	168
第十三章 柬埔寨在战斗中所起的作用	182
第十四章 新生	200
第十五章 北京——后方根据地	219
第十六章 我要控诉	235
第十七章 春季攻势	253
第十八章 未来	275

DB 42 64

后 记	290
主要人物一览表	299
大事年表	304

前 言

十六年来，柬埔寨一直生活在 1970 年 4 月 30 日发生的事件的阴影下。那一天，美国的坦克闯进了她的边界，美国的轰炸机开始系统地把柬埔寨的城镇和村庄化为一片瓦砾和灰烬。在本书里，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记述了从他在五十年代中期初次同杜勒斯兄弟（他们分别领导着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的关系重大的会见开始，直到 1970 年 3 月 18 日政变的背景。

这一记录的描述是很典型的：它全面描述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经济大国如何运用各种手段迫使一个小国偏离它自己所选择的政策，设法搞掉该政策的缔造者和主要执行者。在西哈努克同杜勒斯兄弟最初几次的会见中，就有人坚决奉劝他抛弃他的中立主义思想。在伴有军事威胁的外交、政治和经济压力都失败了之后，接着就进入了一个企图搞阴谋和暗杀的时期。当这一切又失败了，最后就用大量金钱收买最上层的一个叛国集团，发动军事政变，并通过美国和它的西贡走狗的武装干涉来使篡权者得以继续掌权。这样才把这件事办成了。通过 1970 年 3 月的朗诺政变，美国居然成功地把它在拉丁美洲常用的那套办法输出到印度支那了。

对我们这些从签订 1954 年日内瓦关于印度支那停火协定起就一直在注视着这场不平等透顶的斗争的人们来说，看

来这出逐渐展开的戏是有其不可避免的发展顺序和结局的。人们对这出戏的剧情太熟悉了。当诺罗敦·西哈努克看起来由于被暗杀分子的子弹或大量收买去的叛卖行径弄得非后退或倒台不可时，柬埔寨的朋友和西哈努克和平中立政策的支持者们往往都怀着痛苦的关切心情，担心得要命。但是那些最了解他的人却深信他是永远不会后退的。

那些狂热支持美国东南亚政策的人们应该考虑的一个问题是：为了实现这些政策就非依靠军事独裁政权这种标准格局不可。这一点对南越、柬埔寨和泰国都同样适用。必须完全服从美国的路线，在政治上有丝毫的偏离都会是不可容忍的。只有当这些政策的推行受到武力的抗击时，美国才会让一点步。比如说，柬埔寨 1970 年的政变就同邻近的泰国在 1971 年 11 月 17 日发生的政变十分相似。只凭传闻泰国在向中国和北越送秋波，以及科曼外长在考虑中立主义的好处等理由，就足以搞起一场把他依·吉滴卡宗元帅树为军事独裁者的政变。就象朗诺在柬埔寨篡夺了政权后的所做所为一样，他依的第一批行动就是解散政府、议会的两院和废除宪法。同在柬埔寨一样，美国在泰国的空军不久就被用来支持新政权。

华盛顿在 1970 年 4 月 30 日事件公开暴露以前就对柬埔寨进行地下战争了。诺罗敦·西哈努克对这些肮脏透顶的勾当不仅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而且还提供了详尽的文件证据。第三世界一定会怀着特殊的兴趣来研究这本书的，因为很多第三世界的国家都在不同的场合下受到阴谋圈套和压力的胁迫，而这些胁迫又都是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其他机构作为搞垮这些

国家的序幕而施加的。

本书的材料是由诺罗敦·西哈努克用法语口述，由我写成英文，根据我们都同意的篇名来划分章节，然后由西哈努克亲王加以订正。由于他用的不是他本国的语言，而且又被译成第三国的文字，这就意味着：本书要是直接译自诺罗敦·西哈努克的柬埔寨语的话，一定会更加辛辣尖刻、更加生动活泼。写本书的工作主要是在1971年12月下旬到1972年1月在国家元首的北京住宅里进行的。接着我又在1972年3月同他在上海和北京举行了进一步的工作会见后基本写成，并且随着柬埔寨国内形势的发展又补充了一些新的材料。

当我一走进西哈努克亲王的总部，从人员的角度就显然可以看到政变的一个侧面。头一个接待我并同我安排工作时间的的是掌管西哈努克的礼宾事务的西索瓦·梅达维亲王——他是同朗诺一起发动政变的施里玛达的兄弟。1972年1月，出席元首官邸欢迎两位柬埔寨乒乓球运动员——他们是在南朝鲜参加比赛后返国途中，从朗诺的保安人员手里逃脱出来的——归来的人群中就有一个是郑兴的妹妹，而郑兴是在政变后不久取代西哈努克任国家元首的。

郑兴的妹妹自己就是一名乒乓球运动员，现在她在北京学习医科。她的两个兄弟也在北京学习工科。看来甚至那些首要的阴谋家们在他们自己的家里也只是少数派。至于说他们在柬埔寨整个社会中所处的地位，诺罗敦·西哈努克的叙述是很有说服力的。

作者把本书当作重新赢得他的祖国的独立斗争中的武器之一，同时也把它作为对其他国家——它们已被选定为日后

的牺牲品——的警告。

W. G. 贝却敌

1972年6月30日于巴黎

序

报道导致 1970 年 3 月 18 日旨在废黜我作为柬埔寨王国国家元首的政变诸事件的书籍、材料为数着实不少。其中有的持同情态度，有的则不甚友好，有的比较客观，有的则倾向性很强。有些书的作者，利用曾为我工作过因而知道的一些机密，自称掌握“内幕情况”——其实往往都是些不关重要或无关大局的东西——为的是要确立自己作为这方面的专家的名声。这些人编造了一些荒诞的情节，无非为了掩盖他们自己的贩卖行径。

另外一些在政变后到柬埔寨去的人倒是真心实意想要重新恢复事物的原来面目。不过，他们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来观察事物，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事物，试图把问题讲清楚，而他们对这些问题是既无了解又缺乏作出精确评价所必需有的客观态度。

许多西方作家写的文章和书籍都有一个共同点：总是在贩卖“西方最高明”的论点。亚洲人对于那种认为高加索文化高人一等的看法是很敏感的，因为我们遭受殖民主义侮辱的时间太长了，不可能有另一种想法。

有些来自远方的报道，用心倒挺善良，但却缺乏事实根据并且对我们的历史也不了解，因而显得逊色。由于全世界对我们柬埔寨人民扮演了自己并不想演的角色的剧情都颇感兴趣，这类报道能否被接受为真正的史实是成问题的。

几乎所有这些书籍和文章都没有涉及到最重要的关键问题——为维护和平和独立而斗争；我国的主权和中立——而相形之下，一切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要衡量我过去三十年领导柬埔寨的功过，只能从这个角度出发，不能以那些有关国内政治的胡言乱语为根据，而这正是许多作家所爱依靠的东西。对于柬埔寨事务方面，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人太多了，而有些人则根本不想见到森林。尽管他们走遍了多个国家，尽管他们在学术界很有名气，但事实却证明，许多观察家竟不如我们农民中水平最低的人那样明事理。农民在搞清独立与殖民主义之间的差异以及在分清和平与战争方面的觉悟，很快就被美国炸弹给提高了。

我之所以要在这本书里把我在柬埔寨舞台上（我在其中经常扮演主角）所经历的触目惊心的事实写出来，为的就是要澄清史实。可惜我由于缺少文件档案而遇到了一些困难。当我1970年1月离开我们和平的绿洲去法国疗养时，我身边只带了为了进行疗养所必需的最少量的行李。显然行李里并未带有历史性的文件。

但是，手头的证据仍然足以证明美国坚决地不断地要干涉我国的内部事务，特别是中央情报局在一系列阴谋活动中所起的作用，而1970年3月18日的军事政变就是这些阴谋活动的高潮。

我决定把这一切经过口授给一小批作家中的一位——他们对我们民族的尊严、我国人民的愿望以及我个人在捍卫这些愿望中所起的作用，一贯显示了同情、了解和尊敬。

诺罗敦·西哈努克

1972年6月于北京

第一章 莫斯科——北京

“亲王殿下，您今天不应该动身。今天既是星期五又是13号。”在到机场搭乘从巴黎飞往莫斯科的飞机的路上，我的一名助手半开玩笑地说了这些话。时间是1970年3月13日早晨。我并不迷信，于是笑了一笑并照样搭乘该班机飞往会见俄国领导人了。五天以后，当时我还留在莫斯科，我被废黜了——而到现在为止，苏联政府还没有承认在我被废黜之后不到两个月就在北京成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结果，既是星期五又是13号的那一天毕竟是个不吉利的日子。

在莫斯科机场，波德戈尔内主席迎接了我。由于我的访问是政治性的访问，不是国事访问，所以就没有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

在欢迎仪式之后，波德戈尔内主席对我说，已经准备好一架飞机，等着把我直接送回金边。

他说，“如果您愿意，可以在莫斯科休息一夜，然后就在第二天早上飞往金边。西哈努克亲王，我们信任您。您确实是贵国人民不可缺少的领袖。但重要的是，您得直接飞回柬埔寨去掌管国家事务，不要让它落入朗诺和施里玛达手中。您必须采取措施，不让柬埔寨逐渐陷入被美国人接管的局面。您必须阻止朗诺和施里玛达给正在为自己祖国的解放而进行英勇斗争的南越人民制造各种困难。”

我回答说，我必须十分慎重地考虑这些问题。我有很多需要考虑的事情。3月8日那天，在柴桢省发生了反对越南人的示威，我得到的报告表明，这些示威者的幕后操纵者是当时担任首相的朗诺。3月11日，一群从外表看来象是青年学生和学龄儿童的暴徒袭击了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大使馆。几小时之后，接着又袭击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河内）的大使馆。我接到的报告又再次表明，这是陆军——具体来说是朗诺——干的事。在这两次事件中，袭击者的核心都是由朗诺的弟弟朗农上校指挥的五十来个穿便衣的军人所组成。这远远不是欧洲报纸和美国电视台所天真地报道的“自发的示威”。事先准备好了用英文写的标语，而英文在我国的公众示威活动中是很少使用的。摄影师和人群都得到了做好准备的预先通知。这一切都表明，这场戏是事先早就筹划好了的。

我一听到袭击使馆的消息就打电报给我的母亲哥沙曼王后陛下，谴责这一暴行是“那些把他们个人利益和家族利益置于国家前途和人民命运之上的人们的行为”。我对右派发动政变的可能性提出了警告，并说我将回国反对那些应对这事负责的人。但是我又指出，如果人们选择追随他们“走一条把柬埔寨变为第二个老挝的道路，我将不得不辞职”。

3月10日，我在巴黎的法国电视广播中说，金边的右派分子利用我长期不在金边的机会，*企图改变柬埔寨的政治方向。他们希望我们参加美国阵营。我指出右派和中央情报局早已有联系，并且再次提出有政变危险的警告，认为“一切取决于陆军的态度”。

* 当时我在法国南部的格拉斯疗养。

当时我只考虑到副首相施里玛达和他的右派集团的情况。我仍然完全信任朗诺，并以为他会使用陆军对付任何颠覆的企图。我知道施里玛达从1969年6月柬美复交时起就和美国大使馆过从甚密。我在巴黎答电视记者问时就曾预言，如果我失败了，那前景将会是十分不妙的。

我给王后陛下的电报招来了更多的示威行动和对越南侨民，包括对他们的教堂的残暴的袭击。这同我们的佛教文化和宽容的传统是背道而驰的。我自己的消息提供者送来了很多报告，也都反复指出暴行的带头者是穿便衣的军人。我开始考虑到朗诺是否有可能已经转而反对我了。我不愿意信以为真，因为我同他在一起度过了大半辈子，而且我一直把他当成是我的左右手。他的效忠宣言——现在我回想起来，他的这种宣言未免太多了——总是比我的其他大臣的宣言更为显著。我想起就在没几个星期前，他在法国还重申了他对我的忠诚。

示威和捣毁使馆的正式借口是，边境地区出现了越共和越盟军队。没有人能比朗诺知道得更清楚，即使民族解放阵线的部队偶而进入边境地区，他们也并没有对我们造成任何损害。如果说他们享有“庇护所”，这些“庇护所”也都是在东北部人口稀少的森林里。在“鸚鵡嘴”地区——不能提供任何掩护的平坦的稻田——一个这样的“庇护所”也没有。无论怎么说，民族解放阵线的目标是西贡，而不是金边。他们是在为解放祖国而战斗，而不是为了要侵略我们。多少年来，正象摩洛哥人和突尼斯人在阿尔及利亚的抵抗斗争中对阿尔及利亚抵抗战士出现于他们境内不闻不问一样，我们对民族解放阵线

出现于我国境内所采取的官方态度，也是假装没有看见。越南抗敌战士出入柬境并没有干扰边境人民的生活。如果他们需要什么东西，而我们的人民有这样东西并且愿意出售的话，那他们就出钱买。他们回避我们的妇女。当朗诺把西贡军队引进来时，我们的人民对另一种类型的越南人可算是领教了。

我们边境地区的农民所遭受的苦难来自于美国的炸弹和炮弹，而不是来自于偶然出现的越共。在经常遭到轰炸而且炸得最惨的地区却从未有过任何越共的足迹。在柴桢省和其他边境地区被炸以后，发现的尸体都是柬埔寨农民的尸体，其中包括很多妇女和儿童。这一点在国际监督委员会进行调查以后已为好几十个报告所证实。

无论如何，如果美国人以他们能调动的一百多万军队，其中包括五十多万他们自己的军队，都未能从他们那边封锁住边界，要我们以总数只有三万人的军队守卫我们所有的全部边界，其中包括经常遭到威胁的柬泰边界，又怎么能期望我们从我们这一边对边界进行封锁呢？朗诺一向同意我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如果他现在以越共的出现为借口来改变我们的政策，并且公然对抗我，那肯定是发生了什么更为严重的名堂了。

我是在考虑了这些问题以后才告诉波德戈尔内主席说，我将按照我对莫斯科访问的原定日程行事，然后按原计划继续前往北京。不管怎样，我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观察金边的事态发展。后来，有人说我错过了我的机会，假如我当时立即飞回金边的话，我是可以控制得住局面的。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说法是否对。

报纸上报道说，我到莫斯科去是为了要求苏联协助把越共逐出柬埔寨。情况并非如此。我到莫斯科去主要是为了请求他们援助我们，加强我们的军事地位。我想通过谈判签订一项军援协定。美国—西贡军队不断从东面侵犯柬埔寨，而中央情报局支持的自由高棉叛徒集团也不断从他们在泰国的基地出发，从西面入侵柬埔寨。每天都发生侵犯柬埔寨领空的事件。这些才是真正的威胁，而柬埔寨人民也是这样看待它们的。自从我 1963 年拒绝接受美国军事援助以来，我们的美国军事装备一直没有更新，因此什么都缺乏，特别是运输工具。陆军的军官们为此感到焦虑，除非赶紧想办法，军官们要求恢复美国军事援助的危险是确实存在的。我甚至建议苏联派一个象美国军援和顾问组*那样的小型军援代表团到金边来估计我们的需要，并训练我们的武装部队使用苏联武器。

经过了几天的会谈，俄国人同意提供我们所需的一切。但是为时已晚矣。

在我离开莫斯科之前，柯西金总理在克里姆林宫为我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午宴。他让我坐在他的对面。在喝咖啡的时候，我们谈到了柬埔寨的局势：

他说，“您必须防止朗诺和施里玛达从背后捅民族解放阵线一刀。如果他们竟敢这样干，我们永远也不会饶恕他们。对我们的越南同志来说，这是一个困难的历史时刻。他们在为祖国的解放而进行斗争。搞掉朗诺和施里玛达，您已经证明您是反帝的。您给了民族解放阵线以宝贵的支持。您已经

* 美国军援和顾问组(MAAG)在美国开始卷入越南时，在西贡起着和这类似的作用。